

政治叢書第三種

中國國民黨  
史概論  
(一)

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出版

# 中國國民黨史概論

汪精衛講授並手自記錄

## 導言

兄弟覺得對諸君講授中國國民黨史，實在有點困難，因為我們現在還未能够有一部完全的黨史，而做黨史這件事情，也確實是不容易的，大概總要經過下面的三種手續，方纔有個頭緒。第一是蒐集史料，先把一切關於本黨經過的事實，蒐集起來，作為黨史的材料所謂材料，決不能單靠着文字的記載，於文字的記載以外，還有許多事實，留在同志的腦海裡，必要假以時日，煩他們將腦海裏的記憶，記載出來，纔能把幾十年來本黨的事實，得較為豐富的記載，這件事情，必須速做，否則一個同志死了，他腦海裏記憶的事實，也就隨之埋沒。第二是審定史料，我們一面蒐集史料，一面將蒐集得來的史料，加以精密的審定纔能分別真偽，這番工作，比蒐集史料，還要繁難。第三是編纂史料，於審定史料之後，必須將所審定



的條分縷析，網舉目張起來，然後可以做成一部有系統的黨史。以上三種手續，苟缺其一，黨史便做不成。如今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，雖經指定專員，著述黨史；却因為這三種手續，還沒完備，所以黨史急切還不能做成。在未有黨史以前，講授黨史的困難，可想而知，何況兄弟在此講授黨史的時間，統共祇有十點鐘，欲在這短少的時間，講授繁重的黨史，實在更是困難。所以兄弟打定主意，不叫做講授黨史，而祇叫做講授黨史概論，所注重的不在各個的事實，而在幾個重要的概念，因為概念清楚，則於黨史，已得其綱要。所謂幾個概念，第一是革命運動的時代背景。第二是革命的主義及政策。第三是革命黨的組織及紀律。在這十點鐘內能否將這幾個概念解釋明白，尚不可知，但總要儘先將他講完再及其他概念。諸君須要知道，中國最近幾十年來革命的事實，幾乎可以說是本黨的事實，黨的名稱，有興中會、中國同盟會、國民黨、中華革命黨，中國國民黨，而本黨的主義，是始終一貫的。始於本總理孫先生之創做，繼以全國人民之信仰贊成，

日多一日，中國革命運動，因以日益擴大。所以本黨的運動，便是中國的革命運動。因為除了本黨之外，中國沒有第二個革命團體，這是數十年來顯著的事實。兄弟敢信，諸君明瞭這種關係之後，必然增加對於本黨之信託，同時增加對於中國革命之決心與勇氣。

## 第一章 中國最近之革命運動之時代背景

這一章要分以下幾節來說明

### 第一節 革命何以發生

從科學眼光看來，無論那一椿事實，決不會無緣無故，突然發生的，必須那個環境，需要着那種事實，然後那種事實，纔會發生。革命也是人類一椿事實，決不能逃此例外，所以要知道革命何以發生，必要先知道那時代的環境，是怎樣的。

我們知道，如果那時代不需要革命，則革命決不會發生。祇是所謂需要，有兩種必要條件，方纔顯出。一是怎樣知道需要。二是怎樣得着需要。這最好

拿一個譬喻來說明，一個人病了，往往不知道是有病，知道是有病了，往往不知道是什麼病，知道是什麼病了，往往不知道怎麼醫法。這三層知識，一層比一層困難。一個人病了，總覺得不舒服，覺得辛苦，却往往不知道這就是病，至於知道是什麼病，非醫生不能，知道要怎麼醫法，更非醫生不能。病人是需要醫治的，而對於自己的需要，不容易知道，不容易得着，具如此。國家之有存亡危急，如人之有病一樣。國家有存亡危急時，需要革命，猶人病時，需要醫治一樣。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病，尚且不容易知道，何況一國人民，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，如何容易知道，所以有時國家危急存亡，已在眼前，而一國的人民，尚以爲太平無事。

一個人對於自己是什麼病，尚且不容易知道，何況一國的人民，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，如何容易知道根本原因所在呢？所以有時對於國家危急存亡，雖然知道憂懼，却於國家危急存亡之所以然，完全是隔靴搔癢。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病，應該怎麼醫法，尚且不容易知道，何況一國的人民，對於國家之危急存亡，如何容易知道

救濟呢，所以有時雖然知道國家危急存亡之所以然，而於怎樣救治竟和病急亂投醫一樣。人病時須有醫生，猶之國家存亡危急時，須有革命。醫生認定病人的病狀，非用解剖手術，不能痊癒，便無疑無惑的要施行解剖手術，但於施行解剖手術之先，必要病人明瞭自己的病狀，知道非用解剖手術，不能痊癒，醫生方纔能够奏刀，這就和革命之必要宣傳一樣。施行解剖手術之際，病人不免流血，不免痛苦，這就和革命之必要流血痛苦一樣。施行解剖手術之際，如果不慎，往往使病人的痛苦延長，甚至痛苦增加，這就和革命之際，方法不善，必致延長或增加國民痛苦一樣。醫生的本意，是不要病人受痛苦的，然不施行解剖術，無痊癒之望，故祇能使病人稍受痛苦，以求痊癒，這就和革命之以犧牲爲幸福的代價一樣。所以革命者之於民衆，猶之醫生之於病人，第一要他知道爲什麼要革命，第二要他知道如何革命，這裏頭固貴乎有知識有技能，而尤貴乎有熱誠有道德。

如上所說，可知道革命之所以發生，是那時代需要革命，詳言之，是那時代，

國家已陷於危急存亡，除了革命，沒有其他救治的方法，所以纔發生革命。不過時代的需要，往往不容易顯出，所以纔須研究怎樣使人知道需要，和怎樣使人得着需要。革命運動之艱難百折，委曲繁重，皆由於此。祇因爲既有此事實，便不得不然，假如沒有此事實，而硬去革命，便和將一個無病的人，硬拖入解剖室一般，那就成了笑話了。

## 第二節 中國以前發生革命之原因

中國以前何以會發生革命呢？中國四十多年的歷史，往往有革命的事實。中國人民之能革命，已於歷史上得了證明，至於中國人民之何以要革命，也於歷史上得了回答。

先就民族來說，拿歷史來看，可以說中華民族確是能够獨立的經過四千多年，他還能巍然存在，國家雖然給人亡過，民族決不會亡過。對於異民族的壓迫，往往

能將他們同化了去，不然便終於把他們驅除了去，如殷之熏鬻、周之蠶狁、漢之匈奴，都不會和中華民族鬥爭過，然至多受他的騷擾而已。不但民族沒受影響，國家也沒受多大影響，東晉的時候，五胡亂華，國家便亡了一半，但民族依然存在，南宋的時候，女真入寇，國家便亡了一大半，但民族依然存在，及至蒙古入寇，中國整個的國家便都給他亡掉了，但民族却還是不會亡掉，及至滿州入寇，中國整個國家又給他亡掉了，但民族却還是不會亡掉。中國亡於蒙古九十多年，亡於滿洲二百六十多年，何以國家雖亡而民族尚存，因為中國自有歷史以來，和異民族相遇，祇有政治上、軍事上的失敗，沒有文化上、經濟上的失敗，我們要知道，政治軍事，是國家所以存在的條件，文化經濟，是民族所以存在的條件，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，雖失敗，而文化上，經濟上却沒有失敗，所以國家雖亡，而民族不亡。民族既然存在，當他們政治軍事勢力強盛的時候，以文化經濟做自己民族的掩護，等到他們政治軍事勢力衰弱的時候，便起來將他們驅逐，恢復自己已亡的國家，到那時

候，他們不是驅逐了去，便是同化於我爲一民族了。

就民權來說，拿歷史來看，中國國家雖沒有民權的制度，中國人民，却不能說沒有民權的思想。孔子說：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孟子說：賊仁者謂之賊，賊義者謂之殘，殘賊之人，謂之一夫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，又說：民爲貴，君爲輕，得乎丘民而爲天子。其他類此的話，在古人典籍中，往往看見，黃梨洲原君一筆，說得更爲透徹。中國人民，因爲有此思想，所以對於君主暴虐無道，民不堪命的時候，人民便會起來革命，好像是天然的道理，和人民正當的權利一般，便是歷史家也承認人民有此權利。對於秦一世，隋煬帝等時代，人民革命，都左袒人民，不袒君主，所以我們雖然不能說中國國家有民權的制度，却不能不說中國人民，沒有民權的思想。

就民生來說，凡是人民要求革命，其最大原因，都是由於生計之壓迫。拿歷史來看，所有革命表面上是原因於君主之無道、政治之腐敗，實際上，却是因爲君主

無道，政治腐敗的結果，以致人民生活，沒有保障，社會經濟，備受壓迫，一般人民，窮無所之，遂不得不铤而走險。歷朝末造，所醞釀出來的革命，沒有不是如此的，試拿明朝來說，明朝之亡，人都知道是亡於滿州，然使那時沒有李自成張獻忠一般盜賊，擾亂西北，明朝還不至沒有餘力對付滿洲。李自成張獻忠做賊的原因，由於搶米，所以當時有米賊的綽號，當時西北一帶，民窮財盡，於此可見。

西北一帶，所以民窮財盡的原因，却因為倭寇擾亂東南，不能不竭西北之財力，以轉輸軍費。然則東南荼毒，延及西北，以致東北亦受其弊。由此說來，革命原因，實發源於民生問題，真是古今中外，所莫能外，不過沒有民生主義來解決他，所以止於大亂一場，得不到長治久安的結果便了。

如此說來，中國從前所以發生革命，完全由於時代需要，不過一般人民，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為什麼要革命，既不甚明白，於如何去革命，更不甚講求，自然得不到革命的完滿效果，祇弄成一治一亂的局面，其實所謂治，不過久亂

之後，人思奮息，所謂亂，也不過醞釀既久，偶然爆發，需要革命的原因，是無時不存在的。

### 第三節 中國最近發生革命運動之原因

中國以前之革命，其原因已如上述，所以最近之革命，其必要與可能，絕無疑義。就民族來說，中國從前既然能驅除蒙古，自然必能驅除滿洲。就民權來說，以滿洲最近數十年來，君主之無道，政治之腐敗，自然會發生革命。就民生來說，最近數十年來，民生之凋敝，社會之枯窘，自然會逼一般人民走向革命那一條路去，這真是二十四史上，一個依樣葫蘆，絕不會有例外的。祇是最近數十年來，中國之革命運動，和以前之革命，有大大不同的一點，這一點是什麼哩？是中國最近數十年來之環境。中國最近數十年來之環境，是以前所沒有的，上頭說過，中國四千年來，與異民族相遇，祇有政治上，軍事上之失敗，沒有文化上經濟上之失

敗。却是最近數十年來，所遇着的民族，和以前絕不相同，他們有所謂帝國主義，帝國主義之根據，固在於修明政治，強固軍事，尤在於經濟之發展，而文化之發展，與經濟之發展，互為因果，例如十九世紀以來，英國因為工商業發達便勤求製造，發明機器，結果科學發達，使歐洲文化，煥然一新。又因為文化發達，便出產豐當，交通利便，結果工商業發達，其勢力普及於世界。論起政治修明，軍事強固，經濟發展，文化昌明，本來不是壞事，甯可說，凡是國家，凡是人民，皆當致力於此，無如那時代英國及歐洲各國的生產制度，完全建築於私人土地資本之上，以致生產機關，為私人所壟斷，生產利益，也為私人所壟斷，所謂文化與經濟，成為私人之享樂品，所謂政治軍事成為私人之保障物。少數私人得此憑藉，對於國內，便壓迫一般勞苦民衆，對於國外，便壓迫一般異民族，對於異民族及其所居住之土地，創出一個殖民地名詞，將殖民地人民的勞力，及土地的生產，滿他掠奪原料的慾望，同時利用這些原料，製成商品，銷售於殖民地，供他榨取利益的慾望。

• 這兩重慾望，向殖民地取夾攻的形勢，真是威逼利誘，無所不至。從前所謂亡國，政治上軍事上失敗便算了，如今殖民地主義，所謂政治軍事不過是一種手段，其目的乃在於經濟之吸收經濟枯萎，文化自然也便枯萎，所以其結果，不止亡國，真是滅種。最先夷爲殖民地的是美洲，其次非洲及印度，其次澳洲及南洋群島，其次自然是東亞了。中國和這些帝國主義相遇，不但政治上軍事上發生劇烈的鬥爭，經濟上文化上也發生劇烈的鬥爭，不但決國家的存亡，而且決種族的存滅。此種劇烈的鬥爭，以鴉片戰爭爲開幕，直至今日劇烈的程度，有增無減。

如此說來，中國最近之革命運動，除了以前革命所有的各種原因，依然存在之外，還添了一種新的原因，這一種新的原因，比之以前更爲嚴重，更爲迫切，所以中國最近時代需要革命，比之以前，其程度何止百倍加甚。換句說話，從前革命推倒無道君主及異民族侵掠，便算滿足，如今革命，却是要推倒帝國主義。

#### 第四節 中國最近革命運動與時代背景

照以前所說，中國最近需要革命，已無疑義，祇是如何纔能顯出這需要呢？換句話說，便是如何纔使人知道需要呢。

說到這裡，我們對於創始中國革命運動之先知先覺，本黨總理孫先生，當表敬意。

今年三月十二日，孫先生卒於北京，遺囑第一句是『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』，今年是西歷一九二五年，上溯四十年，是一八八五年距鴉片戰爭，已四十五年了。鴉片戰爭之後，中國曾發生過一回革命，是為太平天國之役，在中國革命史上，雖然放出異彩，但其大體，究竟和劉宋朱明差不多，只能算入中國以前的革命之範圍裏。中國最近革命之第一幕，不能不說是一八八五年，那年孫先生立志顛覆清廷，創建民國，是為第一時期的開始。由此十年至一八九五年，孫先生起第一次革命軍於廣州，是為第二時期的開始。由此十年至一九〇五年孫先生成立中國同盟會本部，是為第三時期的開始。由此十年至一九一五年孫先生統率中華革

命黨與軍閥及帝國主義苦鬥，是爲第四時期的開始。由此十年至一九二五年孫先生遺命中國國民黨繼續國民革命的工作，這可說是第五時期的開始了。以上四年，劃分做四個時期。每一時期爲十年，并非有如此明瞭整齊的劃分，不過爲讀者容易記憶起見。然劃分的大體，也還不錯，更有可以幫助讀者記憶的，就是一八八五年的時候，有中法戰爭及媾和。一八九五年的時候，有中日戰爭及媾和。

一九〇五年的時候，有日俄戰爭，一九一五年的時候，有日本提出二十一条。

一九二五年的時候，有青島、九江、漢口、上海、廣州各處慘殺案。這些帝國主義的侵畧狀況，恰恰與國民革命的運動，作一對照，更容易發人深省，使人得明瞭而深刻的印象，還有可以助讀者記憶的，今年爲一九二五年，歲在乙丑，上溯十年，歲在乙卯，上溯十年，歲在乙巳，上溯十年，歲在乙未，上溯十年，歲在乙酉，整整的四十年，我們知道，這四十年內，中國的革命運動，是怎樣的，時代背景，又是怎樣的，便可知道，那時代怎樣需要革命，與革命怎樣適應於時代之需要了。

(甲) 第一時期

距今四十年前，孫先生立志顛覆清廷，創建民國的時候，也就是中法戰爭的時候，那時代背景，是怎樣的，試述如左。

一、外交方面 鴉片戰爭以來，帝國主義者，爲取得經濟侵畱的基礎，不斷的用軍事侵畱，爲達到目的之手段，英法聯軍攻破廣州之役，及攻破天津北京之役，都是用這種手段的特徵。自從天津條約，北京條約締結以後，滿洲政府，對於帝國主義，不敢輕開戰釁，而帝國主義，在中國亦已取得經濟侵畱的基礎，覺得不必再用軍事侵畱，已可達到目的，於是變換手段，由威逼而利誘，以買收滿洲政府之心，這種攻心政策，較之戰爭，更加利害。英國遣洋槍隊，幫助滿洲政府，打倒太平天國，以致滿洲政府，感激英國，事事順從，這便是最著的例，在那時候，滿洲政府，早已把破北京，燒圓明園一場惡劇，付之九霄雲外了，況且在那時候，太平天國，已被打倒，滿洲政府，自命中興，一般君臣，興高彩烈，方以爲子孫萬年

之業，從此無憂，須知道，革命之發生，總在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，一般人民，憂心宗國，岌岌然不可終日，方纔不惜犧牲流血，如今既歌舞太平不暇，又何從感覺革命之必要呢？

二、軍事方面 太平天國，被滿洲政府打倒是由於曾國藩李鴻章一般人，練什麼湘軍淮軍，効忠滿洲政府，所以得最後的戰勝。自此之後，湘淮諸軍，得了翊贊中興的名譽，一直到乙酉中法之役，這種名譽，還是維持，在此役，中國軍隊，并沒甚敗仗，諺山之戰，還打了勝仗。中國軍隊的腐敗，還沒有十分暴露，滿洲政府的威信，還沒有十分倒霉。從來革命之發生，總在政府失了威信之後，人民覺得政府沒有什麼可怕，而作惡如故，方纔容易發生反動，如今滿洲政府既然還能維持威信，革命的可能，便沒有十分把握了。

三、社會方面 革命是一件革故鼎新的大事，最近革命，在民族民權民生三方面，徹底改造，尤其是大事中之大事，倘使人民對於改造，沒有極大的覺悟和決心

，革命是沒有可能的。中法戰爭的時候，中國人民的心理，是如何呢？先就物質文明來說：自從鴉片戰爭以來，海禁大開，歐洲一切工藝品次第輸入，至少可使國人對於物質文明得一認識，知道機器製造品，非手工業製造品所能望了。然而異民族間相遇，彼此都不免有抗拒的感情，在各有文明的異民族間相遇為尤甚，在四千年來，以文明自負的中華民族，更其特別加甚，所以當時一般國人，對於歐洲之物質文明，竟會不能認識。如今試述一兩件事，曾國藩和太平天國打仗，最得力的是水師，他的水師，是他所手創，有長龍快蟹等等名目，縱橫長江上下，得意非凡。他做兩江總督的時候，有一日在安慶城樓上，憑視水師，正在神遊目想之際，忽然的有一條英國小火輪，風馳而過，那些長龍快蟹，一霎時便浮沉不定起來，曾國藩看見了，心頭一急，便吐了一口血，這是曾國藩的聰敏過人，他自從見了這小火輪，知道自己幾十年辛勤訓練的水師，全靠不住，所以後來他便派五百學生到美國去留學，在上海和南京設立製造局，提倡格致。曾國藩這個人，算是對於

物質文明 能够認識的。李鴻章因為曾經利用英人戈登的洋槍隊，打破太平天國的李秀成，所以對於物質文明，也能够認識，只是當時的一般士大夫，能够如曾李二人的，實在是最少數。不用說別的，即如彭玉麟之流，他帶慣了長江水師，他便說長龍快蟹，比小火輪還要便捷，他們不只反對輪船，他們還要反對鐵路，當時吳淞新築鐵路，恰巧上海發生瘟疫，他們硬說瘟疫是鐵路惹來的，將鐵路拆了下來，投之江中，以輪船和舢舨比較，以民車和獨木輪車比較，這樣簡單的事實，他們尙且認識不清楚，其他一切物質文明，不能認識，更何待說。對於物質文明，尙且不能認識，則對於精神文明，如倫理道德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等，其不能認識，越發不用說了，所以當時日本雖然已經全副精神去做維新事業，而中國依然糊糊塗塗的，在那裏混日子，男子儘管講究做八股，女子儘管講究綁小腳，此外什麼事都不管。須知道革命之發生，由於精神生活，生了變動，對於國家社會，感覺得有改造的必要，纔會有破壞的決心，和建設的希望，像那時候社會方面，如此混沌，

那裏有革命發生的可能呢。

照以上所說，可知道在乙酉中法戰爭的當時，中國社會實在沒有發生革命的可能性。雖然自從鴉片戰爭以來，革命的需要，已經非常迫切，而在這般社會裏，實在無從着手。我們論到這裏，不能不佩服孫先生的先知先覺，他在那時候，只有二十歲左右，他看破了中國的情狀，立志顛覆清廷創建民國，因中法戰爭一役，知道帝國主義，對於中國侵畱的劇烈，萬萬不能坐視，又知道滿洲政府，若不推倒，則反對帝國主義的工作，無從做起，他顛覆清廷的思想，是從此得來的。一半是鑿於目前形勢，一半是繼承中國民族固有的思想，他創建民國的思想，却是從幼時在檀香山一帶，看見美國民主政治的模樣，加以研究英文的結果，知道世界的大勢，和民主主義的潮流，又因為研究中國歷史的結果，知道歷朝革命所費時費力的，不在乎推翻舊政府，而在乎革命之後，羣雄角立，人人抱著爭王爭帝的思想，所以亂個不休，惟有創建民國，纔可以免此禍患，如此說來，孫先生在當時將民族主義，

### 民族主義已經確立了。

只是在當時社會中，以何憑藉來實現這般理想呢？明亡之後，中國的民族主義，寄存於兩大派人物之中，一大派是讀書人，從前所謂士大夫，如今所謂知識階級，黃梨洲、顧亭林、王船山諸先生，爲之領袖，能將民族主義普及於一般讀書人心裏，但是不久便被什麼博學鴻詞科，將一般讀書人都騙了去了，有了翰林進士尚書侍郎，還管什麼民族主義，及至太平天國出來，一般讀書人，還抱定了「君臣之義已定，夷夏之辯不容再存諸心」的思想，拚命幫助滿洲政府，來打倒太平天國，如今正是歌舞升平的時候，這一大派人如何可以和他說革命呢？又一派是勞動者，從前所謂下流社會，如今所謂勞苦民衆，陳近南先生爲之領袖，能將民族主義普及於一般勞動者的心裏，創立了三合會、三點會、天地會等秘密團體，以反清復明爲口號，他們不是讀書人，沒有翰林進士尚書侍郎等願望，所以民族主義，在他們社會裏，比較能够固結。二百六十多年來，他們對於滿洲政府，起了不少的反抗，

太平天國一役，更是發揮盡致，及至太平天國敗了，什麼哥老會等，都被一般所謂中興名臣買收了。論起來，不讀書便不容易做官，這是他們的好處，然而因不讀書，便沒有知識，便容易被人利用，這是他們的壞處，雖然是總比讀書人好得多，然而在那時候，民族主義在他們社會裏，已成死灰，又如何可以和他說革命呢？

照此說來，孫先生在那時候，要做革命，可以說毫無憑藉，縱使勉強做去，必無失敗，無可疑的。但是革命的最大本領，便是不顧目前的失敗，以求將來的成功，所以孫先生在那時候，明明知道失敗，却偏要拼命做去，他在士大夫社會和勞動者社會，用了不少的力去做革命的宣傳和組織，他落得了一個瘋癲神經病的徽號，能贊成他的不過是少數的幾個人。他在這時候，除了在香港澳門廣州秘密運動之外，他還周歷長江一帶，直至北京蒙古，實地觀察中國大勢，和社會情狀，以儲蓄他革命的勢。所以自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五年，這十年之間，只能名為革命醞釀時期，在這時期之中，孫先生的著作，只有一篇給李鴻章的信，有人看見了這一

封信，便以爲孫先生當時的政治思想，還不過是一些富國強兵的政策，還不會有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，其實這些不過是孫先生表面的文章。他既然要周行內地，深入北京，自然不免要有這外交手段，不但致李鴻章的信是如此，便是當時所謂興中會的章程，也深藏革命的色彩，這是秘密結社秘密行動應有的事。要知道孫先生當時真正的志向，當以他所自著的孫文學說，第八章爲斷。

在第一時期，即革命醞釀時期，雖沒有什麼顯著的事實可記，然却有顯著的意義，可以使我們認識的。一是革命的人應該有極銳利的目光，看出時代的需要。二是看出之後，便要領着羣衆向前去做，不要以爲那時代尚不能做，便不去做，這叫做適應時代，也叫造促進時代。

### (乙)第二時期

一八九五年，孫先生起第一次革命軍於廣州。那年是歲在乙未，正是有名的甲午中日戰爭的翌年，那時代背景，是怎樣的，試述如左。

一、外交方面 乙酉中法戰爭之役，中國的外交方面，雖然是隱患潛伏，還沒有到爆裂的時候。由此十年，至於甲午，中日戰爭，外交上的形勢，便不同了，滿洲政府之腐敗無能，已完全暴露於世界。而且甲午中日戰爭之役，日本以一戰而得了賠款二萬萬及割讓台灣澎湖列島，種種權利，使各國輕視中國之心，和貪得無厭之欲，一齊並發。於是始而瓜分海港，德國占領膠州灣，俄國占領旅順大連灣，英國占領威海衛，法國占領廣州灣，英國又占領九龍。繼而預備瓜分，各省劃定所謂勢力範圍，英國要求揚子江各省不割讓於他國，法國對於兩廣雲南，日本對於福建，也有同樣的要求，俄國於東北各省，德國於山東，雖沒有要求的形式，而事實已經存在，及至庚子之役，八國聯軍，打破北京，辛丑議和，締結了空前恥辱及喪失權利的條約，又因為俄國在東三省不撤兵的原故，引起了日俄戰爭，中國對於人家在自己領土裏戰爭，却宣佈中立，中國的沒有能力，可以自主獨立，已經成為不可掩的事實。總而言之，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，這十年間中國的外

交，可說是倒霉至於極點。在這種外交情勢之下，無論中國人民，平日如何自尊自大，至此也覺得創鉅痛深，不可終日，人民既然有此心理，對於革命需要的感覺，比第一時期自然較為容易了。

二、軍事方面 在第一時期裏已經說過，從來革命之發生，總在政府失了威信之後，乙酉中法之戰，中國還沒有甚敗，所以滿洲政府的威信，尙能維持，甲午中日戰爭之役却不然了，湘淮諸軍，望風奔潰，如秋風之掃落葉，即所謂北洋新軍，及北洋艦隊，亦大敗虜輸，滿洲政府之威信，從此掃地，以後索性連海軍衙門都裁去了。德國占領膠州灣之後，對於各國的任意宰割，吞聲忍受，不敢稍有抵抗，庚子之役，想以練拳念咒抵擋大破機關槍，以至京城打破，連夜西奔，自此以後，全國人民都知道滿洲政府不是東西，并且知道若不將他驅除，整個中國必然被他撕遷。及至日俄戰爭，直接將他的老家作為戰場，他也毫不在意，更使中國人民看不起。在這種情狀之下，革命之發生，比第一時期，自然覺得可能了。

三、社會方面 甲午中日戰爭以後，沒有幾年，便發生戊戌的維新變法，這種不徹底的改革，與中國的前途，固然不會發生什麼影響，然而這也是時代的過程中所不能免的。雖有己亥的一番反動，却於庚子之役，使維持變法得了一必要的證明，在那時候，物質文明上和歐洲比較，自知不如，已不必說。便是精神文明上，如倫理道德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等，對於舊有的，都起了懷疑，同時對於歐洲輸入的，便生了接受的傾向了。在這時候，發生革命，比起第一時期的確容易得多，在這時候，所需要注意的便是不要給不徹底的改革，牽絆住革命的進行。因為革命的進行，如能不受牽絆，則此種不徹底的改革，對於革命的進行，實是無意之中，與以不少的援助的。

照以上所說，可知由一八九五年，至一九〇五年，十年之間，是中國受極大的打擊，蒙極大的損失的時候。同時也就是中國人民，受極大的激刺，生出極大的變動的時候，孫先生在這十年之間，先後起過兩次革命軍。第一次在廣州，正

在甲午戰爭之翌年，第二是在惠州，恰與庚子聯軍之役，同在一年。第一次革命軍在廣州起事未成，損失了陸皓東一般同志，因為正在甲午戰爭之後，殺八民，雖然不懂得革命的意義，却已經懂得中國的危急。所以孫先生的革命行動，不復如第一時期，自爲癡癲神經病，而另換了大逆不道，謀反作亂等等徽號了。第二次的革命軍在惠州轉戰數月，滿洲政府的軍隊，望見革命軍的旗幟，便心驚膽破，加以那時史堅如在廣州省城，謀爲惠州革命軍的響應，埋伏地雷，攻擊兩廣總督衙門，事雖未成，已經使德壽一般人喪失了魂魄，這第二次的革命軍，論勢力比第一次的革命軍大得多，論影響，也大得多。那時候正值滿洲府迷信義和拳，將京城鬧得昏天黑地，而他們人民對於滿洲政府，輕視憤恨，已經到了極點，所以對於孫先生的革命行動，由大逆不道，謀反作亂等等徽號，而變爲救國志士等等徽號了。

這第二時期，可名爲革命萌芽時期，比起第一時期，的確是得了一些進步。我們推究所以得了這些進步的原因，可以說是時代促進革命，也可以說是

革命促進時代，因為社會受了激刺，生了變化，使革命發生，得所憑藉，故叫做時代促進革命。因為革命黨人，猛向前進，努力不已，使社會覺悟得快，同時使時代進步得快，這叫做革命促進時代。兩者比較，還是革命促進時代更為重要。

假使革命不去促進時代，而等時代去促進革命，則革命的進步，必然遲慢，而進步時所遇着的種種障礙，也必然不能立時掃除。阻誤了革命的進步，同時也就阻誤時代的進步。

試看孫先生在第一時期，絕無發生革命可能的時候，而努力革命，因以有第一次的革命軍之發生。在第一次的革命軍失敗以後，努力不已，因以有第二次的革命軍之發生。我們估量革命之進步，固然不要忘了是受時代的進步之援助，然而試想在那時代，如果沒有革命運動，做中堅骨幹，如何能使泄泄沓沓的人心為之振起，更如何能使不澈底的改革，失了牽絆時代的進步之効力。更何能以革命供給時代的需要呢。所以革命黨人，認清了時代與革命之關係，要以決心與勇氣進行

革命無稍間斷，這是對於革命之責任，也就是對於時代之責任。

(丙)第三時期

一九〇五年。中國同盟會成立本部，舉孫先生爲總理，那年是歲在乙巳，正在有名的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，那時代背景，是怎樣的，試述如左。

一、外交方面，鴉片戰爭以後，庚子聯軍之役以前，滿洲政府，對於各國，雖不承有媚外的行爲，然大體却是仇外，庚子以後，便由仇外一變而爲媚外了。滿洲政府，既然專以媚外爲事，所以各國的武力侵畱政策，已用不着，完全以經濟侵畱，達到帝國主義之目的。所以庚子以後，數年之間，中國的外交形勢，似乎是風平浪靜，然而英德法的三國銀行團英德法美的四國銀行團，已在中國樹立了經濟侵畱之最大基礎。民國以後，加入日俄成爲六國銀行團，既而美國退出，成爲五國銀行團，侵畱政策，既由武力而移經濟，所以各國對於中國的口號，乃由瓜分而移於共管了。

二、軍事方面 庚子以後，滿洲政府汲汲於練新軍，有人問他道練新軍做什麼用呢，他答道：所以防家賊的。這一句話，可以代表滿洲政府未造的心理，總而言之，在那時候，滿洲政府的軍備，非所以對外，乃所以對內。換句話說，非所以對付帝國主義，乃所以對付革命黨，滿洲政府之見勢拙，革命黨祇勇往直前，於此可以概見。滿洲政府之練新軍，說所以防家賊，誰知因為練新軍的結果，將無數革命黨人參入行伍中去，於是軍隊反正，遂為滿洲政府之致命傷，這是滿洲政府所不及料的。

三、社會方面 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，十年之間，社會方面，所發生的是維新與守舊的問題，一九〇五年以後，守舊不成問題了，另換了革命與君主立憲的問題，在那時候，革命派與君主立憲派之激戰，宛如從前維新派與守舊派之激戰一般，終之君主立憲派不澈底的思想，敵不過革命派澈底的思想，理論上既說不過，革命派，實行上，又不如革命派之勇猛精進，所以幾年之間，滿洲政府，還沒有倒

，君主立憲派，已經聲嘶力竭了。

照以上所說，可知道一九〇五年以後，革命運動，已由萌芽時期，入於進行時期。就一九〇五年來說，革命運動，已樹立之一個堅固偉大的基礎，便是中國同盟會之成立。在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前，如興中會，雖是以革命為目的的團體，但是黨的組織，還沒有完備。自從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後，方纔有所謂黨。除了孫先生所手創的興中會一派之外，還有黃克強所手創的華興會，蔡子民所手創的光復會，以及十七省的革命分子，一齊加入，結為一個團體。舉孫先生做總理，各個黨員，本於通力合作的精神，分頭做事，於本部之外，並成立了多數的支部。黨的組織，日益進步，而黨之宣傳，也隨以俱進。宣傳的總機關有民報，其餘海內外各報，無論是日報，是旬報，是月報，都是將黨的主義，向民衆極力宣傳。所以自一九〇五年以後，革命事業，成為有條理，有系統進行。一九〇六年，便有萍鄉醴陵之革命軍，接着又有潮州黃岡惠州欽州廉州鎮南關河口等處之革命軍。

此外還有軍隊反正，如廣州新軍，安慶新軍等。又有暗殺的組織，如徐錫麟之刺恩銘，吳樾之刺王大臣，熊成基之刺載灃，汪精衛等之刺攝政王，溫生才之刺李鴻章，陳敬岳之刺李準等等。可以說道，自從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後，幾年之間，革命黨人所流之血，連續不斷的，灑遍於中國各處了。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，事雖未成，而其精神實足以感動民衆。所以同年八月十九日之役，武漢起義，全國各省，次第响应，數個月的工夫，便造成清帝退位，民國統一的大業。這是決非偶然的，革命促進時代的功效，於此大見了。

#### (丁) 第四時期

民國元年以後，至於今日，時代背景，是怎樣的，試述如左。

一、外交方面 辛亥革命以前，帝國主義者，對於中國革命運動，似乎不大注意，似乎以為中國革命運動，是不會成功的。及至辛亥革命，始猛然吃了一嚇，最先是日本政客，極力主張中國橫分爲二，南方共和，北方帝制，以期滅創中國革

命的勢力。跟着便是英國在國會提議，從前已讓日本在東方出頭，如今不可讓中國在東方出頭。恰好在那時候，孫先生卻任臨時大總統，在上海租界裏外國人的歡迎會演說，劈頭一句，便是收回租界，於是般帝國主義者，恍然知道中國革命之目的，不僅在驅除滿洲，而尤在對抗帝國主義了。於是一般帝國主義者，相約起來，一致行動，其惟一目的，便在扼此新生嬰兒中國之吭，而制其死命。

六國銀行團，於以成立，一方面定出極嚴酷的借款條件和担保品，使中國經濟之權，歸其掌握。一方面利用這些借款，資助軍閥，養成反革命的勢力，以阻革命的勢力，從這兩條政策，民國元年，定了下來，至於今日，絲毫無改。袁世凱於民國二年以後，何以能將國內的革命黨趕盡殺絕呢？是因為有五國銀行二萬五千萬的大借款，段祺瑞於民國六七年來，何以能將國內的革命黨殺得四分五裂呢？是因為有日本三萬萬的大借款，曹琨吳佩孚於民國九十年來，何以能悍然自命，要殺盡革命黨的種子呢？是因為有英美半明半暗的各種借款，其數目至今還沒有清算，段

謀瑞於民國十三四年間，何以能死復生，又與革命黨爲敵呢？是因爲有日本半明半暗的各種借款，以及金佛郎案等等。民國以來的外交現象，一言蔽之，帝國主義勾結軍閥之現象而已。

二、軍事方面 民國元年以後，袁世凱擁着一部分殘餘的兵力，藉着帝國主義的帮助，日復一日的擴充起來，成就了所謂北洋軍閥。及袁世凱死了，手下一般家將，支解了袁世凱的勢力，宛如董卓死了，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蜂擁起來一般，這筆爛賬，直至今日，還沒結算。北方既然如此，南方當初，雖然是革命的根據地，然而因爲受了帝國主義，和軍閥的兩重壓迫，一時支持不住，倔強的或死或逃，柔懦的便不免降服了。從此以後，北方反革命的成爲大軍閥，南方變節的革命黨人，成爲小軍閥。大軍閥志在把持中央，便倡言統一，小軍閥志在割據地方，便倡言聯省自治。十四年來，窮兵黷武，日有所聞，驕兵悍將，觸目皆是，生生的把一個中華民國做弄得暗無天日。

三、社會方面 民國元年之初，中國社會確是一種朝氣，倘使這種朝氣，日蒸月上，仍然可以做出種種改造事業，無如這種朝氣，一剎那間便被軍閥與帝國主義勾結的現象，掩蓋住了。自從鴉片戰爭以來，帝國主義的勢力，侵入中國，中國的手工業，漸漸為機器工業所破壞，加以不平等條約的束縛，中國工業，更沒有振興的機會。於是出口貨日少，入口貨日多，全國以內，土貨日少，洋貨日多。這些現象，祇有最久遠深。起初的時候，還沒覺得，最近數年，便不由得不覺得了，民窮財盡，已經成了急轉直下的趨勢，再加以軍閥縱橫，政治黑暗，財政割裂，越發民不聊生。古人說得好，富然後教，如今生計上既受這般壓迫，一切精神上的文明，從何說起哩。祇有窮奢極侈舶來品，向奄奄垂盡的人民，不絕的引誘，和療病的人，偏重淫樂一般。社會方面的受病，幾於不可救治了。

照以上所說，可知道民國成立以後，十四年間，革命運動，反由進行時期，入於僵遲時期。在這時期，革命運動，所受的壓迫，所遇的障礙，比民國成立以前

困難何止倍蓰。在這頓挫時期中，革命黨人，恍如孤軍入了重圍，除了力戰而死的，能保存他的革命人格之外，其餘或是潰圍而去，落荒而走，或是屈了雙膝，向敵人投降。在這頓挫時期中能堅持着革命的旗幟，始終不變的祇有一個孫先生和他的極少數的信徒。他起初與袁世凱爲敵，始敗而終勝，繼而與段祺瑞，馮國璋，徐世昌，曹锟，吳佩孚爲敵，也是始敗而終勝。至於始爲同志，繼爲敵人如陳炯明等等，更不用說了。然而以上的敵人，都不是他真正的敵人。他真正敵人，是帝國主義。以上的敵人，不過是帝國主義之工具而已。看了四十年奮鬥的歷史，便可明白，看了四十年的時代背景，便更可明白。他積了四十年奮鬥的經驗，和看破了四十年的時代背景，知道欲以孤軍制勝此敵人，第一着手，就整頓內部，所以他始而組織興中會，繼以組織中國同盟會，極力做整頓的工夫。至於民國元年時代的國民黨，原不是他所願意組織的，所以二年以後，便改組爲中國革命黨，八年以後，又改組爲中國國民黨，十二年以後，中國國民黨的名詞，雖

沒有改變，而其組織與紀律，却大大的改變。這種改變，是使內部益加嚴密，同時又益加擴充，就嚴密來說，他淘汰了一切反革命的分子，使內部純為革命的分子，就擴充來說，他注意於接近民衆，和世界上革命的先進，被壓迫的民族，被壓迫的階級，聯合戰線，以上種種，整頓內部的計劃，無非欲使此革命團體，能適應時代，能促進時代，以求革命最後之成功。我們於此，可以說道，民國元年以後，革命運動，雖然由進行時期入於頓挫時期。而民國十二年以後，革命運動，已由頓挫時期，而入於激進時期了。

民國十六年一月再版

定價 毫洋壹角

著作者 汪兆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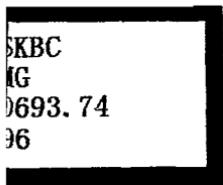
翻印

自由

發行者

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 
政治部宣傳科

635  
#576  
240 3111  
180



1014